

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和代际观念^{*}

刘成斌 巩娜鑫

【摘要】文章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运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考察家庭照料行为对老漂族在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家庭照料行为对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有抑制作用,主要表现为照料晚辈型的老漂族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的意愿显著降低。就人口特征来讲,健康状况差的老年男性不愿意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的倾向更为明显,社会融入与生活习惯制约了老漂族的居留意愿,这可能与代际均衡重心下移导致的养老需求,特别是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及传统的性别分工有关。整体上老漂族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意愿仍保持在较高水平,而家庭照料分工影响下的部分老漂族表现出不愿意继续与子女共同居住的倾向,表明部分养老需求出现分化,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的约束与社会文化模式的惯性等因素使多数老年人在面临养老选择时不得不依赖于家庭。

【关键词】家庭照料行为 居留意愿 代际观念 老漂族

【作者】刘成斌 华中科技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巩娜鑫 华中科技大学大学社会学院,硕士研究生。

一、问题提出

老年人口随迁是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推进家庭化流动的重要潜力,老年流动人口能否随家庭化流动实现市民化就构成城镇化政策的重要议题。从老年人口流动的原因看,有随子女进入城市的,也有为照顾晚辈生活或纯粹为了家庭团聚而流动的。总体上看,老年流动人口成为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家庭化迁移与发展的力量之一,但由于老年流动人口不像其子女那样有城市的就业、社交网络等,他们对家庭内部互动有较强的依赖性,在社会交往网络方面较弱,甚至对城市社会交往存在一定的陌生性。因此,老年流动人口有“漂泊感”成为一种普遍现象,据此称其为“老漂族”。

居留意愿是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并在该地生活一段时期后对未来迁居安排的愿望和想法(孟兆敏、吴瑞君,2011)。在生活压力增大、生育政策调整及养育成本升高的社会背景下,由老年父母帮助照顾孩子不仅能缓解年轻一代的生存压力,减少子女在城市生

^{*}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风险评估与对策研究”(编号:16BRK030)的阶段性成果。

活的经济成本,也便于满足家庭养老需求。然而,随着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和生活需求提升及生活方式的嬗变,传统养老观念面临挑战。21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结构转型与工业经济更新,社会结构与经济因素导致流动家庭生活方式出现新的变化,逐步消解传统文化约束,逐渐动摇家庭养老的基础(钟涨宝,冯华超,2014)。

二、文献综述

(一) 家庭化流动的老漂族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口流动出现家庭化迁移的趋势。国家统计局2011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08~2011年,举家外出农民工每年增加约100万人(盛亦男,童玉芬,2015)。2011~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报告》显示,2011年,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46人,2013年为2.5人,2015年为2.61人。2014年卫计委流动人口监测调查数据显示,近九成已婚新生代流动人口夫妻共同流动,61%实现了完整的核心家庭迁移。2017年的流动人口监测数据显示,家庭化趋势进一步增强。

“家庭化迁移”趋势表明,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倾向于将父母接到流入地同住,由此形成了老漂族(杨菊华、陈传波,2013;李敏芳,2014)。这既是传统家族文化观念的延续,也反映了成年子女对父母的责任。但也有研究指出,是子女需求而不是老人需求决定了老人的养老安排。随着城市生活压力增大、养育成本上升,年轻子女更需要来自父母的帮助(许琪,2013),深受传统家庭观念影响的老年人,对家庭代际责任的担当超越了自身的养老需求,对后代的责任引领老年人背井离乡照顾儿孙(陈盛淦、吴宏洛,2016)。

(二) 家庭照料行为可能削弱老年人的居留意愿

为了照料子女而家庭化流动的“老漂族”往往是被动性流动。现有关于老年人对子女家庭照料的研究侧重于隔代抚养的讨论,此种照料是在老漂族与子女及孙辈同住的前提下发生的照顾,主要由子代的需要来决定参与程度(李芬、风笑天,2016)。有研究表明,被动性流动的“老漂族”往往会面临健康成本,由于隔代照料往往需要“老漂族”付出较长时间进行体力劳动和家务料理,这会损害老年人的身体、心理健康(肖雅勤,2017)。有学者从中国传统的家庭文化分析,认为老年人帮助成年子女照顾家庭往往是无私的付出,是体现长辈对子女、孙子女关爱的重要方式(孙鹃娟、张航空,2013)。老年人为子女提供帮助是一种自身价值的证明方式,不指望从子女身上获取赡养回报,等孙辈入学或长大不再需要老年人照料时,“老漂族”会回到农村。因此,这种阶段性、暂时性的“老漂族”不存在“定居”。进入城市与子女一起生活的老漂族可能不是在养老,而是被啃老。

Silverstein等(2012)指出,现代化进程要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离开家乡和土地,家庭模式趋于核心化,导致老年人可获得的养老资源减少。一方面,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削弱了亲缘关系,共同生活时间的缩短弱化了子代与亲代之间的感情,空间地理距离的拉

大限制了代际互动的频率。另一方面,流动经历改变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进一步强化了个体意识,淡化养老观念。家庭养老正在从文化伦理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一种“非强迫性、非规范、以家庭个体能力自愿选择的行为模式”(姚远,1998)。

综观现有研究,学者们的分析主要关注现代化背景下个体主义价值观觉醒的年轻人代际观念转变对传统家庭养老方式的主观影响,以及人口流动背景下的家庭养老观念异化。忽略了以下两个重要的问题:(1)老年人在家庭养老中的角色定位。典型意义上的老年支持只涉及单向的老年父母对成年子女的依赖(靳小怡等,2014),以往研究大多将老年人视为家庭的负担,认为老年人需要从子女身上汲取资源,获得帮助和照料,却忽视了老年人作为资源提供者的角色。(2)现代化背景下老年人代际观念的转变。社会转型对家庭代际关系的冲击,同样会改变老年人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研究表明,子代持续地啃老会降低老年人无私为子女操心的打算,转而为自己寻求养老积蓄,代际关系将走向更加理性、更少亲情的新平衡模式;特别是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老年人更倾向于机构养老,机构养老的市场化与规模化势在必行(贺雪峰,2009;刘二鹏、张奇林,2018)。

基于以上论述,本文利用2017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筛选出1 068位因养老或照料晚辈随子女共同流动的老漂族,分析家庭照料行为对“老漂族”居留意愿的影响,以及由此对当前中国养老问题可能产生的影响。

三、研究假设和分析思路

从中国家庭城镇化趋势与家庭化发展的实践看,老漂族实际上仍然充当着家庭资源提供者的角色,年轻人需要老年人共同分担城镇化的社会成本,子女需要老年人以“家庭养老”这种方式为自己的小家庭提供帮助。但这种资源代际交换式的家庭养老模式能否持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老年人是否能保持无限责任伦理的代际观念。在现代化的冲击与子女个人意识觉醒的背景下,老年人作为行为主体,在与子代的互动中,同样可以调整自己的策略选择。从这一角度考虑,老年人的价值判断很可能会由情感逻辑(代际团结)转向理性逻辑(代际交换),老漂族可能会通过评估子女的行动进而调整自己的居留选择。

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老漂族。对这部分流动老人,学界尚没有形成统一的概念。在综合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将“老漂族”定义为:为照顾晚辈或养老而在非户籍地跟随子女一起居住的60岁及以上的流动老人。

家庭居住模式是家庭凝聚力的重要表现,若老漂族群体的代际观念没有发生转变,从情感逻辑和责任伦理(代际团结)的解释路径出发,虽然子代的行为表现出不同的逻辑取向,但秉承无限责任伦理、坚持家庭主义福利观的老漂族倾向于承担对子女的无限扶持和照顾义务,反映在居留意愿上,不同老漂族之间将不会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若

其中部分老漂族的代际观念发生了转变,从理性逻辑(代际交换)的解释路径出发,为养老而流动的老漂族其流动取决于老年人的养老需求,符合费孝通提出的抚育—赡养的反馈模式,实现亲子代之间的历时性互惠;对晚辈家务照料与养老并重的老漂族与子代之间达成即时性的交换均衡;而仅为照顾晚辈而流动(家庭功能替代)的老漂族其流动取决于子女需求,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老年人对成年子女的“逆反哺”。对于这部分在前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抚养责任却不仅迟迟得不到年轻人的赡养回报还要继续承担对子女家庭照料责任的老漂族来说,很可能降低自己对子女的赡养期望,倾向于离开子女家庭。据此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与为养老而随迁的老漂族相比,基于照料晚辈而流动的老漂族表现出较低的居留意愿。

四、数据和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数据来自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该调查由国家卫计委开展,涵盖 31 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采用分层、多阶段、与规模成比例的 PPS 抽样,样本总量约为 17 万。本研究主要抽取流动人口中年龄在 60 岁及以上(1957 年 5 月及以前出生)的被调查者,并且是由于照顾晚辈、养老的原因到流入地与子女共同居住的样本,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得到有效样本 1 220 个。

(二) 变量测量

本研究试图分析的核心问题是不同流动原因的老漂族居留意愿的差异与分化。因此,研究变量设置如下。

1. 因变量。本文的因变量为老漂族的居留意愿。利用调查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进行测量,包含“是”、“否”和“没想好”3 个类别。剔除居留意愿没想好的样本后,实际进入模型的样本量为 1 068,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2.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老漂族的流动原因,包括养老和照顾晚辈两类。利用调查问卷家庭成员及收支信息中“本次流动原因”的题目进行测量。首先根据问卷说明,筛选出流动原因为家属随迁和照顾自家孩子的样本,仅保留家属随迁样本中与子女共同居住的部分,得到为养老而流动的老漂族样本。通过重新编码生成流动原因变量,0 表示养老,1 表示照顾晚辈。

3.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研究,本文选择个人特征(性别、年龄、户籍、健康、教育)、流动特征(流动范围、流入时间、配偶情况)及社会经济特征(生活适应、文化认同、经济保障)作为影响老漂族居留意愿的控制变量。并进行以下赋值:性别:女性为 0,男性为 1;年龄:低龄组(60~69 岁)为 1,中龄组(70~79 岁)为 2,高龄组(80 岁及以上)为 3;户籍:农村(农业)为 0,城市(非农业、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居民)为 1;健康状况:

不健康(不健康但生活能自理、生活不能自理)为0,健康(健康、基本健康)为1;受教育程度:文盲为1,小学为2,初中及以上为3。流动范围:市内跨县为1,省内跨市为2,跨省为3;流入时间:短期流动(流入时间≤5年)为0,长期流动(流入时间>5年)为1;配偶情况:与配偶共同流动为1,有配偶但未一起流动为2,丧偶为3。生活适应:不适应为0,适应为1;文化认同:不认同为0,认同为1,经济收入水平采用过去一年家庭平均月总收入的对数。

(三) 统计模型与分析策略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居留意愿,典型的二分类变量,采用 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具体分析。模型构建为:

$$\log \frac{P_1}{P_2} = \alpha + \beta X_{ij} + \gamma Z_{ij}$$

其中, P_1 为具有居留意愿的概率, P_2 为没有居留意愿的概率。 α 为常数项, X_{ij} 为流动原因, β 为回归系数, Z_{ij} 为影响老漂族居留意愿的其他因素。

五、实证分析

(一) 老漂族群体异质性描述

1. 流动原因与居留意愿的描述性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养老型老漂族 635 人,占样本的 59.46%,照料晚辈型老漂族 433 人,占 40.54%,有居留意愿的老漂族仍是主流,占 94.99%,不愿意跟子女共同居住的老漂族只占 5.01%。但在这 5.01%的老漂族中,按照流动原因分类比较结果显示,照料晚辈的老漂族中,没有居留意愿的比例为 7.60%,而养老型老漂族只有 2.32%,两类老漂人口的居留意愿差 5.28 个百分点,并且这一差异的卡方检验显著。这表明流动原因不同的老漂族之间居留意愿存在差异。

2. 两类老漂族的群体异质性描述。两类老漂族均以女性为主,其中为照料晚辈而流动的老漂族女性占比更高;年龄方面,为养老而流动的老漂族平均年龄(67.19 岁)高于为照料晚辈而流动的老漂族(65.39 岁);户籍方面,城市户籍占比略高于农村户籍,二者比例基本均衡;此外,在流动特征方面,为照料晚辈而流动的老漂族中跨省流动比例更高,比养老型老漂族高 10 个百分点。从流入时间来看,两类老漂族的平均流入时间均在 6 年以上,且养老型老漂族流入时间略长。从配偶情况来看,大部分老漂族与配偶共同流动,在养老型老漂族中这一比例为 57.95%,照料晚辈的老漂族中为 68.13%。此外,养老型老漂族中的丧偶比例较高,约占总人数的 1/3。社会经济特征方面,照料晚辈型老漂族的家庭月收入水平较高。

3. 老漂族返乡意愿和原因。这些不愿意居留在城市的老漂族意味着他们想要回流到家乡或去其他地方(如其他子女家)。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有返乡原因的测量指标,在不愿意居留城市的老漂族中回答要返乡的比例为 91.07%。

表 1 群体异质性描述统计

变 量	整体		养老		照料晚辈		最小值 / 最大值
	均值或 频数	标准差 或百分比	均值或 频数	标准差 或百分比	均值或 频数	标准差 或百分比	
居留意愿	0.95	0.22	0.98	0.15	0.92	0.27	0/1
人口特征变量							
性别	0.36	0.48	0.41	0.49	0.31	0.46	0/1
年龄	66.27	5.54	67.19	6.01	65.39	4.90	60/96
户籍	0.54	0.50	0.52	0.50	0.56	0.50	0/1
健康状况							
健康	413	38.67	234	36.85	179	41.34	
基本健康	449	42.04	266	41.89	183	42.26	
不健康能自理	188	17.60	119	18.74	69	15.94	
生活不能自理	18	1.69	16	2.52	2	0.46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小学	240	22.47	158	24.88	82	18.94	
小学	294	27.53	177	27.87	117	27.02	
初中	281	26.31	170	26.77	111	25.64	
高中或中专	175	16.39	89	14.02	86	19.86	
大学专科	55	5.15	31	4.88	24	5.54	
大学本科	23	2.15	10	1.57	13	3.00	
流动特征变量							
流动范围							
市内跨县	144	13.48	100	15.75	44	10.16	
省内跨市	363	33.99	227	35.75	136	31.41	
跨省	561	52.53	308	48.50	253	58.43	
流入时间(年)	6.70	5.51	6.75	5.93	6.65	5.08	1/35
配偶情况							
有且共同流动	663	62.08	368	57.95	295	68.13	
有但未共同流动	118	11.05	49	7.72	69	15.94	
丧偶	287	26.87	218	34.33	69	15.94	
社会经济特征							
生活适应	0.89	0.31	0.90	0.30	0.89	0.31	0/1
文化认同	0.48	0.50	0.47	0.50	0.50	0.50	0/1
家庭月收入	15873.97	12543.25	14114.42	11767.51	17566.35	13036.24	0/90000

本文结合这个返乡原因的选择情况对老漂族群不愿意居留城市的心理机制进行一些推理分析。

2017 年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中原有的返乡原因分类非常细,划分为十八类,除“其他”这一项外,还有十七类。本文将其归为三大类:第一类为主动选择性原因返乡(如家乡自然环境好、家乡有人需要照顾、不能与家乡的家人分居等),第

二类为非经济类原因的被动返乡(如很难融入流入地、不习惯外地生活、年龄大、身体不好),第三类为经济原因的被动返乡(如家乡生活成本低、家里土地劳作需要人等)。除“其他”这一项原因未知外,老漂族选择返乡的第一、二、三类原因占比分别为39.23%、39.21%、13.72%;养老型老漂族的选择分布分别为33.32%、33.34%、16.67%;照顾晚辈型老漂族的选择分布分别为42.42%、42.42%、12.12%。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在选择家乡自然环境好等主动选择因素上明显高于养老型老漂族,这也是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在主动选择类原因上明显高于养老型老漂族的构成来源,这表明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具有更高的主动选择能力与空间。

照料晚辈型老漂族比养老型老漂族更容易感觉到在流入地社会融入的障碍,主观上的不习惯更为明显和强烈。越是需要父母帮忙照顾家庭的年轻人或中年人,其工作更忙,时间更紧张,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以职业发展需求和职业圈交往为重心,对老人的精神支持往往比较少。照料晚辈型老漂族不但没有职业支撑,在受教育水平、信息接收能力、社会交往机会甚至语言表达能力等方面都是弱势群体,这种弱势造成老漂族在城市生活的孤独、郁闷甚至心理压抑感往往比较突出,由此,照料晚辈型老漂族返乡意愿更高——改变这种在城市生活的融入困难境遇,进而选择回归家乡的生活习惯。

(二) 流动原因与居留意愿的模型分析

基于上述研究假设,本文通过构建回归模型,对流动原因与居留意愿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表2中模型一仅包含控制变量,模型二在模型一的基础上纳入流动原因,模型三和模型四进一步探究了养老型老漂族与照顾晚辈型老漂族群体内部居留意愿的影响因素。

模型一结果表明,女性更倾向于与晚辈共同居留在一起,与健康状况差的老漂族相比,健康状况好的老漂族的居留意愿是其2.40倍;在城市流动的时间长度显著增加老漂族的共同居留意愿,流动时间在5年以上的长期流动老漂族居留意愿是短期流动群体的2.81倍;适应当地生活的老漂族居留意愿是适应困难人群的2.58倍。随着家庭化流动时间延续和延长,老漂族的生活适应能力会改善,其在城市居留意愿也逐步增强。此外,高龄组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低龄组的15.0%;受教育水平在初中及以上的老漂族居留意愿为未接受过教育(文盲)的3.59倍;与配偶共同流动的老漂族相比,未与配偶共同流动的群体居留意愿仅为35.3%,但在丧偶的群体中这一几率没有显著差异。

模型二纳入流动原因后,解释力与模型一相比提高了4.7个百分点,照料晚辈的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养老型老漂族的19.7%。加入流动原因后,配偶状况与居留意愿的关系不再显著,这说明配偶状况与流动原因之间存在共变的可能;文化认同对居留意愿产生显著影响,认为按照老家风俗习惯办事不重要的老漂族居留意愿为参照组的2.36倍。这表明文化认同可以增强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此外,其他变量仅改变了其作为控制变量的作用强度,而对显著性没有影响。从模型二的回归结果看,本研究提出的家庭照料

表 2 老漂族居留意愿的回归结果

变 量	模型一	模型二	模型三(养老型)	模型四(照顾晚辈型)
核心自变量				
流动原因(养老)		0.197**(0.094)		
人口特征变量				
性别(女性=0)	0.408*(0.165)	0.331**(0.141)	0.398(0.216)	0.244*(0.156)
年龄(60~69岁)				
70~79岁	0.602(0.331)	0.496(0.271)	1.755(1.609)	0.305(0.214)
80岁及以上	0.150**(0.110)	0.093**(0.070)	0.916(0.880)	0.004**(0.005)
户籍(农村=0)	0.981(0.514)	1.025(0.511)	0.973(0.555)	1.196(0.880)
受教育程度(文盲)				
小学	2.228(1.212)	2.183(1.169)	3.830*(2.611)	1.903(1.380)
初中及以上	3.592*(2.030)	3.028*(1.647)	4.246*(2.567)	2.891(2.269)
健康(不健康)	2.403*(1.083)	2.348*(1.024)	1.153(1.207)	3.126*(1.776)
流动特征变量				
流动距离(市内跨县)				
省内跨市	0.989(0.602)	1.281(0.823)	1.253(1.115)	1.066(1.007)
跨省	0.317(0.191)	0.466(0.262)	1.469(1.284)	0.225*(0.156)
流入时间(短期流动)	2.811*(1.175)	2.613*(1.098)	1.352(0.852)	4.134*(2.698)
配偶(共同流动)				
未共同流动	0.353*(0.175)	0.390(0.202)	0.113**(0.077)	0.430(0.282)
丧偶	1.074(0.479)	0.742(0.311)	0.358(0.197)	1.323(1.122)
社会经济特征				
生活适应(不适应)	2.578**(1.241)	2.333*(1.137)	1.764(1.481)	2.516(1.769)
文化认同(不认同)	2.078(0.910)	2.357*(0.981)	6.014*(4.957)	2.739(1.596)
经济收入	1.021(0.247)	1.046(0.178)	0.559(0.289)	1.167(0.185)
样本量	1068	1068	635	433
Pseudo R ²	0.1904	0.2374	0.1519	0.3381

注:表中系数为取e之后的结果,括号内变量为参照组,括号内数据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5%、1%、0.1%的水平上显著。

假设得到了验证,即与养老型随迁的老漂族相比,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居留意愿显著下降。由此表明,老漂族中基于家庭照料分工出现了与子女共同居留的态度分化,这表明老漂族中部分人的代际观念发生了由无限责任伦理观或情感逻辑向代际互惠或理性逻辑观念的转变,也就是说部分老漂族如果面临承担家庭照料的需求时,他们会倾向于拒绝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为照料晚辈而流动的老漂族不一定会完全顺从子女需求而是出现行动策略的改变,不愿再维持与子女间的逆反哺或啃老式的居留关系,因而形成较低的居留意愿。

模型三表明,文化观念、配偶是否随迁和作为人力资本的教育是影响养老型随迁老漂族的居留意愿选择的主要因素。与模型一相比,模型三中的性别、年龄、流入时间、

生活适应不再显著,这表明基于养老动机随迁的老漂族在居留意愿上不受性别、年龄等先天因素的影响,也不受流动时间长短、生活适应能力的后天因素的影响,而主要受教育、文化认同、配偶是否共同流动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水平为小学和初中及以上的居留意愿分别是文盲的 3.83 倍和 4.25 倍,这表明教育在老漂族的养老定位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受教育水平较高的老年人可能更明事理、更能与子女在家庭共同生活中协调沟通、和平相处而共同居留在城市一起生活;未与配偶共同流动的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与配偶共同流动的 11.3%,这表明老漂族的配偶作为家庭化进程中共同伙伴的重要性,即家庭化进程中老漂族不愿意忍受老伴之间的彼此分离而一个人在城市与子女共同居住,而丧偶的老漂族与参照组没有差异;认为按照老家风俗习惯办事不重要的老漂族的居留意愿是参照组的 6.01 倍,老漂族中的老年人越能接受城市人处理人情世故的方法,越倾向于居留于城市。

模型四显示,性别、年龄等先天因素以及健康、流动距离、流动时间等后天因素是显著影响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居留意愿选择的主要因素。男性愿意居留在水市的几率远低于女性。这表明男性老年人往往更难与子女共同生活,而女性老漂族与子女共同生活的倾向更高;与健康状况差的老漂族相比,健康状况好的老漂族的居留意愿是其 3.13 倍,这表明老漂族的自身健康状况的影响至关重要,老年人健康越差能够提供的家庭照料越少,反而更需要被照料,在这种情况下,老漂族更倾向于返回家乡;流动时间在 5 年以上的老漂族居留意愿是短期流动者的 4.13 倍,这表明即使老漂族的共同流动是基于家庭照料而不是养老动机,时间也会改变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高龄组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低龄组的 0.4%,表明高龄组老漂族拒绝在水市共同居留的意愿更强烈;跨省流动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市内跨县的 22.5%,表明流动距离与城市居留意愿呈反比,流动距离越近的老漂族居留意愿越强。

六、总结与讨论

上述模型及分析表明,流动原因显著影响老漂族的居留意愿,需要照料晚辈的老漂族居留意愿仅为养老型老漂族的 19.7%。这表明老漂族基于流动原因而在居留意愿上产生明显分化。

(一) 研究结论

1. 家庭养老依然是老年人养老需求的主流模式。中国家庭养老仍然是包括老漂族在内的大多数老年人养老意愿的主要选择,本研究中老年族绝大多数仍选择继续与子女居住。这表明实践中的养老选择仍然是以依赖子女的主干家庭模式为主流。受传统家本位文化的影响,目前中国流动人口家庭中无论是成年子女还是父母,在遇到养老问题或家庭照顾需求时,首先倾向于通过家庭来解决问题。传统文化既为家庭成员提供了应

对养老和家庭照料等生活困难的首选解决办法,也为家庭养老延续和适应提供了文化上的正当性和合法性。

2. 老漂族的年龄阶段和流动特征是影响其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60~69岁的低龄老人与70~79岁的老漂族在各类居留意愿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而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与前两组老人存在明显差异,这表明高龄老人的养老意愿具有其自身的特殊性,即高龄老人更多的选择是不与子女共同居留。但高龄老人的被照料和养老需求理应更强烈,无论是生活方式融入困难还是高龄老人不愿意给子女增添负担,这就意味着高龄老人群体的养老具有社会化的潜在需求和更高可能性。从流动时空上看,流动距离除影响家庭照料型老漂族外,不影响养老型老漂族的居留意愿,这表明流动距离这一空间障碍已经不是老漂族流动和在城市居留的主要困难;但流动时间是影响老漂族人口与子女共同居留在城市的关键因素,即流入时间越长,越有利于提高老漂族的城市居留意愿与市民化倾向。

3. 家庭照料影响老漂族的居留意愿。照料晚辈型老漂族居留意愿较低的事实表明,在现代化与城市化的过程中,老年人并不是社会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同样会根据情况的变化调整自身的行为选择。代际观念发生了转变的老漂族不愿再继续与成年子女之间维持“啃老式反哺”关系。这与老漂族和其成年子女各自所处的生命周期密切相关。在子女核心家庭的早期阶段,由于刚刚进入工作岗位或初为人父(母),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使来自父母的帮助极其重要,由子女需求引发了老年人的流动。这一阶段的老漂族还属于低龄老人,健康状况较好,没有迫切的养老需求。随着时间推移,子女核心家庭情况有所改善,老漂族随着年龄增大、健康状况下降,对子女具有强烈的养老期待。而照料晚辈型老漂族的养老期待如果得不到满足,还不得不为子女需求服务,代际互惠的不平衡加剧。同时,在传统家庭中,女性一般被赋予“亲属照料者”的角色,而男性往往只扮演辅助性的角色。承担较重照料责任的男性老人往往会由于“男主外”的传统角色观念而更倾向于拒绝承担照料晚辈的家庭分工。

4. 老漂族在城市居留的精神需求和社会融入需要社会支持。中国新型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速度较快,大量随子女进入城市的老漂族由于历史原因往往受教育水平比较低,他们不但缺乏职业方面的社会机会,更缺乏生活方式城市化与社会融入市民化的个体能力,其信息接触到信息接收和消化、应用都存在严重不足。因此,在家乡自然环境好而主动回流和城市融入困难而被动回流的选择上都表达了老漂族强烈的内心渴望和社会融入需求。要解决目前大多数家庭化流动仅局限于核心家庭的困境,必须要结合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促进老漂族的城市定居与市民化,将老漂族的社会融入作为城市化推进的系统构成部分。

(二) 讨论与展望

虽然老漂族总体上仍然以家庭养老为主流趋势,但是部分老漂族已经显示出代际

观念上的分化。部分老漂族人口已不再愿意与子女共同居住,这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生活方式的差异,另一方面可能是老漂族开始寻求晚年生活自主性和追求高品质生活。随着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代际互惠或交换式的养老结构逐渐受到冲击。如果老年群体的文化观念逐步延展成一种自立养老模式的话,就意味着让年轻的父母独立抚育下一代,第一代只养育照料一代子女,而不会照料第三代。

中国的现代化与市场化改革,虽然在就业等领域实现了个体化进程的突飞猛进,青年人群的个体化倾向越来越明显,但老年群体对家庭养老的依赖依然是主流选择,使家庭成为老年个体获取养老保护、归属感和价值寄托的根本来源。大多数老年人群还没有走出家庭养老传统、不愿意迈向机构养老的意愿表明社会保障制度和社会支持不健全制约了老年人的这一选择。由此,老漂族代际观念的变与不变意味着未来中国养老产业化、社会化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完善老年人的社会保障与社会支持条件,进而才能改变其对家庭养老的依赖。

参考文献:

1. 陈盛淦、吴宏洛(2016):《二孩政策背景下随迁老人城市居留意愿研究——基于责任伦理视角》,《东南学术》,第3期。
2. 靳小怡等(2014):《转型期的农村家庭结构及其对代际关系的影响》,《青年研究》,第4期。
3. 贺雪峰(2009):《农村代际关系论:兼论代际关系的价值基础》,《社会科学研究》,第5期。
4. 李芬、风笑天(2016):《照料“第二个”孙子女?——城市老人的照顾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人口与发展》,第4期。
5. 李敏芳(2014):《随迁老人社会适应研究述评》,《老龄科学研究》,第6期。
6. 刘二鹏、张奇林(2018):《代际关系、社会经济地位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基于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2012)的实证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7. 孟兆敏、吴瑞君(2011):《城市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研究——基于上海、苏州等地的调查分析》,《人口与发展》,第3期。
8. 孙鹃娟、张航空(2013):《中国老年人照顾孙子女的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人口与经济》,第4期。
9. 盛亦男、童玉芬(2015):《北京市外来人口调控政策效应的定量分析》,《中国人口科学》,第6期。
10. 许琪(2013):《子女需求对城市家庭居住方式的影响》,《社会》,第3期。
11. 肖雅勤(2017):《隔代照料对老年人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CHARLS的实证研究》,《社会保障研究》,第1期。
12. 姚远(1998):《对中国家庭养老弱化的文化诠释》,《人口研究》,第5期。
13. 杨菊华、陈传波(2013):《流动家庭的现状与特征分析》,《人口学刊》,第5期。
14. 钟涨宝、冯华超(2014):《现代化与代际关系变动》,《天府新论》,第1期。
15. Silverstein, M., Conroy, S.J., Gans, M.D. (2012), Beyond Solidarity, Reciprocity and Altruism: Moral Capital as a Unifying Concept in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for Older People. *Ageing & Society*. 32(7): 1246-1262.

(责任编辑:朱 犁)